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 藏学 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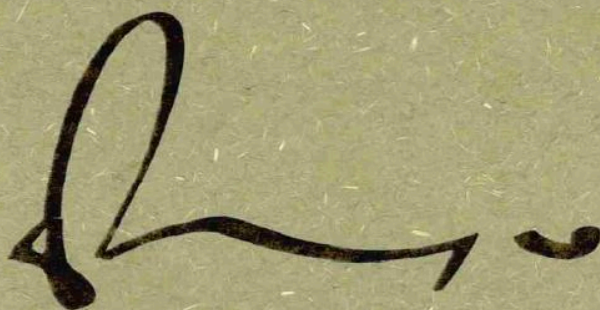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31 辑

2024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 目 录

### 西藏山南乃东区结巴乡桑嘎村带柄铜镜的调查

……………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 1

天宝十二载封常清伐大勃律行军史事考…………… 杜二雄 / 12

西藏西部早期石窟壁画中的佛幡图像研究…………… 卢素文 / 30

### 绰普译师·强巴贝（1172—1236 年）生平事迹考

…………… 尕藏加洋 桑吉卓玛 / 49

###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所造《致十方诸佛菩萨书》译考

…………… 贾学锋 朱宣锦 / 66

明封大善法王星吉班丹考论…………… 王小红 / 91

三部塔尔寺志书跋文初探…………… 才让措 / 109

16—19 世纪中国西藏对克什米尔羊绒贸易研究——以西喜马拉雅地区政局演变  
为中心…………… 刘煜泽 / 125

清末藏事改革中英国的干涉及其侵藏政策的变化…………… 朱明杰 / 144

巴塘华西学校地理学教科书的初步研究…………… 魏毅 旦正 / 164

国民政府时期康定的城市管理及内涵（1939—1944 年）	
.....	王梓杨 / 180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维度——基于西藏视角的分析和考察	
.....	阴海燕 / 199
从结构、主题、人物到作者：《格萨尔》与《斯杰》共同特征的初步调查	
.....	[英]查尔斯·兰博 著 吉多加 译 / 214
摘要 .....	/ 235

## Table of Contents

Investigation of a Handled Bronze Mirror in Samkhar Village, Kyepa Township, Nedong District, Lhokha Prefecture, Tibet <i>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 of Tibet</i> <i>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Xizang University</i>	1
Research on the Military Campaign of Feng Changqing Against Baltistan in the Twelfth Year of Tianbao, Tang Dynasty <i>Du Erxiong</i>	12
A Study of Buddhist Banner Images in Early Cave Murals of Western Tibet <i>Lu Suwen</i>	30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ife of Khro phu Lo tsā ba Byams pa'i dpal (1172-1236) <i>Kalsang Jamyang and Sangya Drolma</i>	49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i>The Letter to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of the Ten Directions</i> Composed by Sa skya Paṇḍita Kun dga' rgyal mtshan <i>Jia Xuefeng and Zhu Xuanjin</i>	66
A Study of Seng ge dpal ldan, the "Great Virtuous Dharma King" Conferred by the Ming Dynasty <i>Wang Xiaohong</i>	9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ree Chronicles of Kumbum Monastery <i>Tsering Tso</i>	109
Shawl-wool Trade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Between the 16th and 19th Centuries <i>Liu Yuze</i>	125
British Intervention, Changes in Its Tibet-Invasion Policy, and the Reform of Tib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Zhu Mingjie</i>	14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Geography Textbook at Batang Huaxi School <i>Wei Yi and Tandzi</i>	164
Urban Management of Kangding (1939-1944)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Wang Ziyang</i>	180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bet <i>Yin Haiyan</i>	199
Tibet's Other Epic: A Tentative Investigation of Common Features in the Gesar Cycle and the Bonpo <i>Gzi brjid</i> <i>Charles Rambl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hakdor Gyal</i>	214
ABSTRACTS	235

# 西藏山南乃东区结巴乡桑嘎村带柄铜镜的调查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内容摘要：**根据对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扎西多卡寺僧人收藏的一件带柄铜镜的调查分析，本文认为该铜镜应出自结巴乡桑嘎村西北侧的桑嘎墓地，年代约为公元前后至吐蕃时期之间。根据对铜镜形制、制作工艺、装饰纹样及动物图像的观察，这件铜镜与已刊布的四件“藏式带柄铜镜”属于同一技术与文化传统，但相对年代可能稍晚。此铜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雅鲁藏布江中游自“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到吐蕃时期区域性文化的承继性和地域特征。

2022年9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博馆员扎西次仁、西藏大学研究生平措扎西等在西藏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温曲（འཇམ་མཁའ་ལྷོ་ཁུ་）河谷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得知，该地扎西多卡寺僧人边巴收藏有一件古代铜镜（本文简称“桑嘎镜”），在其帮助下二人对铜镜进行了初步观察和图文记录。2023年6月，西藏大学教授李永宪率研究生平措扎西、扎西东知、华青才让及沈云遥等人再次赴僧人边巴处对这件铜镜进行了详细观察和测绘拍照等记录，对铜镜发现者等当地村民作了口述采访，并在铜镜发现地进行了现场勘察。

## 一、铜镜发现地概况

根据对村民的口述调查和现场勘察得知,该件铜镜于 2007 年由桑嘎村村民索朗加参(时年 28 岁)在桑嘎村西侧约 600 米的切龙则木墓群(墓地)东缘的坡地取土时发现,后交由扎西多卡寺僧人边巴保存收藏至今<sup>1</sup>。切龙则木墓群于 1984 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前身)文物普查队调查发现<sup>2</sup>,墓群地处雅鲁藏布江北侧勉塘山(ལྷན་པང་རི)东麓的温曲河谷(འོན་མོ་ཁྱུང་རིང)<sup>3</sup>西侧,地势西高东低,地理坐标为东经 91°82'33"、北纬 29°22'15",海拔约 3710 米。该墓群“顺着山脚缓冲坡面南北约 6 公里一线上,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八十多座大小不同的吐蕃时期墓葬,……墓群共分为八组,G 组 M1 位于墓群南部,东面正对结巴公社桑嘎村。”<sup>4</sup>根据当年调查者推断,切龙则木墓群的年代“约在吐蕃晚期”<sup>5</sup>。

2007—2008 年,桑嘎村在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基础建设中,部分村民在村西侧约 700—800 米的切龙则木墓群东缘缓坡上取土建房,形成了数个深达数米的土坑。据铜镜发现者索朗加参描述,铜镜出自一座距地表深约 2 米的取土坑的坑壁土中,发现铜镜时其周围有石块和散乱的骨骸,地面未发现有封土等墓葬遗迹。据此推测,该铜镜应为墓中随葬器物,且此墓可能为石室墓或石棺墓。2022 年,有当地村民发现取土坑所处的坡地因水流冲刷暴露出石棺残迹,接报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于当年 7 月由该所考古研究室主任罗布扎西率队前往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石棺墓 5 座和祭祀坑 1 座,确认该地点为切龙则木墓群之外的一处无封土石棺墓墓地,即桑嘎墓地(图一、图二)。

- 1 2019 年,索朗加参将铜镜交给扎西多卡寺僧人边巴,作为温沟区域历史文化书籍的资料。次年,该铜镜图片选用为《走进温莫龙仁》(ལྷོ་ཁའི་འོན་མོ་ཁྱུང་རིང་གི་ཡུལ་བཤད་ལས་འཛོམས་ཏེ་བོན་དང་བོད་ཀྱི་བཅན་པོའི་འབྱུང་ཁུངས་སྐོར་གླེང་བ)一书封面,并在注释中提及。参见边巴著:《走进温莫龙仁》(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20:205。
- 2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 G 组 M1 殉马坑清理简报》,《文物》1985(9):47-50。
- 3 温曲河谷(即“温”沟)为雅鲁藏布江北岸近南北向的一条山谷,今乃东区结巴乡和索珠乡属地。藏文史籍《太阳王系和月亮王系》(ཉི་མའི་རིགས་ཀྱི་རྒྱལ་རབས་དང་ལྷ་མའི་རིགས་ཀྱི་རྒྱལ་རབས)载“苯教始祖辛绕米沃诞生于此地”(དབུས་མཐིལ་འོན་ཀྱི་ཡུང་པ་ལ། མི་མའི་མགོ་ལ་བོད་བྱེད་ན་བ་ཅན་གཅིག་སྟེ། དེའི་རུས་པ་གཤེན་ཡིན་ཅིང་། ཤེས་རབ་ཆེ་བས། མིང་གཤེན་རབ་ཅེས་བཏགས། ན་བ་རིང་བས་མི་བོང་ཞེས་ཟེར་ཞིང་། བོན་པོ་རྒྱལ་ཡུལ་འོན་མོ་ཁྱུང་རིངས་སུ། རྟོན་པ་གཤེན་རབ་མི་བོ་ཞེས་སྟེ།),参见古格班智达扎巴尖参著:《太阳王系和月亮王系》(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93;又敦煌写本《吐蕃大事纪年》和《赞普传记》等多处记载有与“温”地相关的事件,如“赏赐蔡邦·纳森者为温地方孟氏堡寨、奴隶三百户”(ཆོས་པོང་ནག་མེད་གི་བྱ་དགུ་འོན་ཀྱི་སྟོན་མཁར་ནས། བན་བྱིས་སྟེ་བཟུལ་སྟེ།);“赞普驻于温之那波”(བཅན་པོ་འོན་ཀྱི་རྩ་བོ་ན་བཞགས་);赞普驻于温之阿噶园”(བཅན་པོ་འོན་ཀྱི་ལ་ག་ཅལ་ན་བཞགས་)等,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47、148、162。
- 4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 G 组 M1 殉马坑清理简报》,《文物》1985(9):47。
- 5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 G 组 M1 殉马坑清理简报》,《文物》1985(9):49。



图一 乃东区结巴乡桑嘎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二 铜镜发现地点与桑嘎村相对位置示意图



## 二、铜镜形制及工艺

### （一）铜镜形制

#### 1. 镜身

铜镜保存完好，圆板形镜身，镜面微凸且光洁平滑呈铜黄色，部分镜面有深绿色铜锈及后期划痕，局部发现有红色线痕，可能曾被红色织物包裹过。镜身及镜柄通长 15.5 厘米、镜径 7.9 厘米。镜背中央有一圆形突起，镜背周缘为截面略呈半圆形的凸棱，镜身厚 0.1—0.3 厘米，镜面、镜背下端各有一呈半圆形的下凹部分，为安装镜柄接头预留的榫合面。

镜背中央带小凹点的圆形突起直径 0.8 厘米，高出镜背平面 0.2 厘米，镜背周缘一圈凸棱厚 0.3 厘米、宽 0.6 厘米。镜背呈向心状装饰有外、中、内三圈纹样：最外圈为环形的忍冬卷草纹，该圈纹饰在镜背下端处由一组阴刻的动物图像连接，动物皆头向左侧，三只“剪影式”造型的山羊居前，略呈“十”字形的飞鸟（鹰）居后；中圈为 18 个麦



图三 铜镜镜面及镜背（沈云遥 拍摄）

粒形组成的环形“束辫纹”；内圈（正中）围绕圆形突起由一个五芒星分割成5组“品”字形结构的涡旋星云纹。外、中、内三圈纹饰带之间均有鐫刻的双线弦纹相隔（图三）。

## 2. 镜柄

镜柄通长 7.6 厘米，包括平面近半圆形的接头和截面呈长方形的镜柄两个部分。镜柄接头为铜质，宽 2.4 厘米、高（长）1 厘米、厚 0.4 厘米。前端以弧形榫槽与镜身下缘半圆形下凹的榫面契合，正中有一铁质铆钉将镜身与接头铆定，调查时可见镜身下端与接头榫槽之间有少许空隙，手持镜柄时镜身可前后轻微晃动。接头镜背的一面沿外缘刻有一周弦纹，接头后端凸棱处为安装柄身的銚口。铁质镜柄外包铜框，截面呈长方形，柄长 6.6 厘米、宽 1.6 厘米、厚 0.4 厘米，中段有一道微凸的铜箍，铜箍宽 1 厘米。柄末端为铜片包裹的扁平环状，铜环周长 6.8 厘米、宽 0.4 厘米，上下各有一道凹弦纹。

## （二）制作工艺

### 1. 镜柄安装

桑嘎村发现的带柄铜镜为镜身、镜柄分体制作，镜身为模范浇铸而成，并在下端的两面采用刨、铰等减薄技术预制出呈月牙形的榫接面，以备安装镜柄之用。根据实物观



图四 铜镜镜背纹样（庞颖 绘图）

察分析，镜柄的安装应有三个步骤：首先是将锻打而成的扁平铁柄包镶上铜框，在中段出箍以使铁柄不易折断而更为耐用，并在铁柄末端用铜片包裹成扁环状；第二步是将包镶铜框的铁柄插入铜质接头下端的銚孔，使镜柄和接头连为一体；最后一步才是将镜身预先减薄的月牙形下端嵌入接头前端榫槽，并用铆钉将镜身与镜柄接头固定。

2. 镜背装饰

镜背的装饰采用錾花工艺，即锤击錾刀在器物表面形成凸凹有别的线条或图案。从整体上看，錾点的形状、大小皆不甚整齐，这可能与錾刻技艺和錾刀钢性及刃尖形态有关。与此前刊布的“藏式带柄铜镜”錾花工艺相同，錾点的排列仍是二方连续的线状排列，且纹样的构成也有两种形式，一是以錾刻点为底、留白处为纹的“阳錾”造型，二是以錾点形成纹样线条或“剪影式”动物图像的“阴錾”。两种錾刻形式皆因光照效应可形成深浅有别、亮暗相衬的图形效果（图四）。

3. 镜身合金

2023 年 8 月，根据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pXRF）检测，桑嘎村发现的这件铜镜镜身为铜锡二元合金，其中铜（Cu）含量占比为 70.30%（平均值），锡（Sn）含量占比为 23.80%（平均值，参见表一），与学术界先前论及的“藏式带柄铜镜”同属高锡合金青铜，显示他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冶金技术传统（参见表二）。

表一 桑嘎村带柄铜镜金相学检测数据

金属化学成分（%）							检测部位
Cu	Sn	Ni	Si	Fe	Al	P	
73.40	23.80	0.18	1.61	0.24	/	0.35	镜面光洁部位
70.40	23.60	0.19	4.44	0.18	0.49	0.23	镜背光洁部位
67.1	24.00	0.11	7.88	0.15	/	0.17	同上
76.5	12.7	0.16	6.35	0.80	/	1.21	镜面下端接头
2.28	0.61	/	14.7	76.4	5.37	0.24	铁柄铜框表面（镜背）

表二 “桑嘎镜”与其他“藏式带柄铜镜”合金成分比较<sup>6</sup>

样品 / 检测方法	铜含量占比	锡含量占比
“曲贡镜”（12 次电镜重复扫描）	57.57%	32.23%
“德藏镜”（柏林拉特根实验室检测）	63.11%	25.46%
“牦牛镜”（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72.96%	25.19%
“桑嘎镜”（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70.30%	23.80%

### 三、认识与讨论

西藏带柄铜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始于 1990 年拉萨曲贡石室墓地出土的一件铁柄铜镜（出土编号 M203: 2，本文简称“曲贡镜”）<sup>7</sup>。其后，早年流传至德国和法国的两件西藏带柄铜镜（本文简称“德藏镜”“法藏镜”）分别在国内外刊布<sup>8</sup>，国内学者就这三件铜镜的年代及形制渊源等问题发表了多篇颇有启发意义的研究论文<sup>9</sup>，其中全涛根据三件铜镜“镜背装饰具有统一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提出了“藏式带柄铜镜”的概念<sup>10</sup>。2018 年，西藏牦牛博物馆展出了一件篆刻有牦牛图像的带柄铜镜（本文简称“牦牛镜”），该馆薛江发表专文对此件铜镜与相关的三件带柄镜进行了讨论<sup>11</sup>。随后，李永宪撰文将“牦牛镜”等“藏式带柄铜镜”与西藏西部札达盆地出土的多件短柄铜镜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受“西南夷青铜技术系统”影响的“藏式带柄铜镜”在分布地域和技术

6 其他“藏式带柄铜镜”合金成分数据采自李永宪：《“牦牛镜”与“藏式有柄镜”研究》，《藏学学刊》第 27 辑，2022（2）：18。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08-20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10）：927-937；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7）：642-649；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7）：650-661。

8 N.G. Ronge, V. Ronge, H.G. Hüttel, "Ein eisenzeitlicher Spiegel aus Tibet,"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9-10, 1990: 225-242. 此文汉译文见〔德〕N·G·容格、V·容格、H·G·希特勒著，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189-199；Anne Chayet, *Art et Archéologie du Tibet*, Paris: Picard, 1994: 59. 转引自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藏学学刊》第 5 辑，2009：33-34。

9 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11）：61-69；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藏学学刊》第 5 辑，2009：33-45；全涛：《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藏学学刊》第 6 辑，2010：137-148。

10 全涛：《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藏学学刊》第 6 辑，2010：138。

11 薛江：《西藏牦牛博物馆馆藏铁柄牦牛纹铜镜及相关问题》，《藏学学刊》第 24 辑，2021（1）：173-189。



传统上与西藏西部等地出土的短柄铜镜完全不同<sup>12</sup>，霍巍则指出“西藏带柄铜镜的东、西两系”反映了各自在文化交流上的地域特色<sup>13</sup>。

桑嘎村新发现的这件铜镜为研究“藏式带柄铜镜”提供了新的实物标本，其“藏式带柄铜镜”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保持了铜质镜身和铁质镜柄分体制造再合二为一的制作传统及装柄方法；第二，与镜柄完整的“曲贡镜”和“法藏镜”相同，“桑嘎镜”保持了镜径与镜柄长度大致相等的形制特征（参见表三）；第三，镜背纹样与动物图像皆用“鑿花”工艺制成；第四，镜背纹饰结构和单元样式相同，为向心式多重环形结构；第五，与“曲贡镜”“牦牛镜”相同，“桑嘎镜”镜背近柄处阴鑿有表现本土文化特色的动物图像（山羊及鹰）；第六，“桑嘎镜”出土地点亦在“藏式带柄铜镜”主要分布区，即“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域的西藏南部”<sup>14</sup>。

表三 已知“藏式带柄铜镜”形制数据统计（单位：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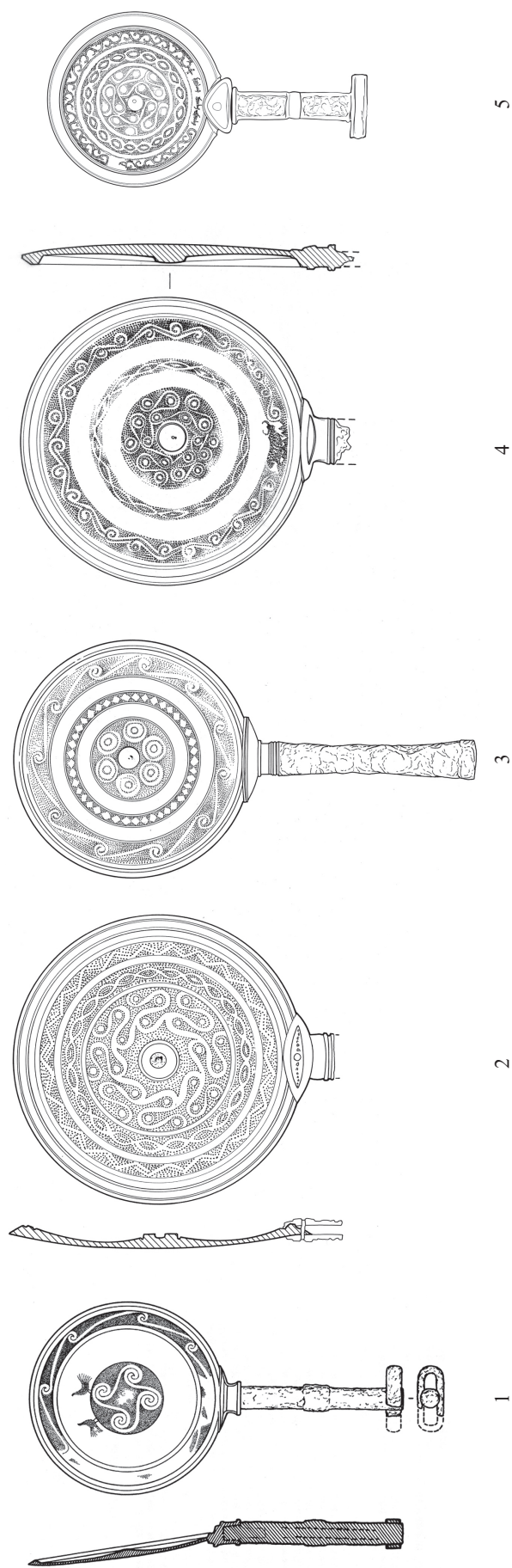
标本	镜径	镜厚	中凸	缘凸	镜柄接头	镜柄	通长
“曲贡镜”	9.4	0.1—0.4	不详	厚 0.3	宽 3.6、高 1.2	长 8.8	18.2
“德藏镜”	12.2	0.25—0.6	高 0.6	厚 0.6	宽 3.7、高 2.1	不详	不详
“法藏镜”	14.3	不详	不详	不详	宽 5.1、高 2.1	长 14.3	28.6
“牦牛镜”	14.4	0.3—0.6	高 0.7	厚 0.6	宽 4.3、高 1.8	残长 0.9	不详
“桑嘎镜”	7.9	0.1—0.3	高 0.3	厚 0.3	宽 2.4、高 1.0	长 7.6	15.5

“桑嘎镜”与先前发现的四件“藏式带柄铜镜”相比较亦有一些差异，例如其形制尺寸小于其他四件铜镜，镜背的鑿刻技艺显得比较粗率，在整体上“桑嘎镜”镜背纹饰鑿点的形状和排列都远不及其他四件铜镜整齐匀称，似乎其“鑿花”技艺处于一种“摹仿”的水平。此外，“桑嘎镜”装饰纹样和动物图像也有一些变化，一是动物图像的朝向与“牦牛镜”“曲贡镜”的牦牛朝向相异，皆为头向左侧。二是动物物种不是牦牛而是山羊和飞鹰，这种差异或变化缘于何故目前尚不能解释，或可能为时代差异，或可能与区域性生业类型不同有关。三是“桑嘎镜”镜背外圈纹样与其他“藏式带柄铜镜”的勾连涡云纹（或勾连折线纹）不同，纹样的连续失去了“勾连”的意味，成为接近佛教

12 李永宪：《“牦牛镜”与“藏式有柄镜”研究》，《藏学学刊》第 27 辑，2022（2）：1-23。

13 霍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东、西两系》，《考古与文物》2024（4）：63-71。

14 李永宪：《“牦牛镜”与“藏式有柄镜”研究》，《藏学学刊》第 27 辑，2022（2）：22。



图五 五件“藏式带柄铜镜”镜背纹饰比较（1-4. 采自李永宪《“牦牛镜”与“藏式有柄镜”研究》，2022：3-12，图三、图四、图一二、图一四；5. 庞颖绘）

绘画中的“忍冬卷草纹”。四是“桑嘎镜”内、中、外三重纹饰带之间都有錾刻的双弦纹（或单弦纹）间隔镶边，但外圈忍冬卷草纹及其镶边双弦纹在镜背左侧中段有近1厘米的断缺，推测可能原来预设在此錾刻其他图像，最后因某种原因放弃，因此在左侧断缺处下端可观察到有长约3毫米的刻痕。最后，有研究者曾指出“藏式带柄铜镜”装饰“纹样的单元数似有某种规律（以‘曲贡镜’‘法藏镜’‘牦牛镜’‘德藏镜’为序）：凡外圈者皆为奇数如7、11、13、21；中圈或正中的纹样单元则皆为偶数，如中圈纹样单元数为16、22、42，正中纹样单元数为4、6、8、6……”<sup>15</sup>，而“桑嘎镜”正中的“星云纹”则与此相异，其纹样单元为奇数（图五）。

值得注意的是，“桑嘎镜”在镜柄制作及其与镜身的合体技术上，显示了“藏式带柄铜镜”镜柄技术的继承与发展。如“桑嘎镜”的铁质镜柄镶包铜框可视为“藏式带柄铜镜”镜柄装饰技术的一种进步或发展；而其铁质镜柄中段出箍、末端呈扁环的形制特征则明显具有“曲贡镜”的镜柄风格；在镜面和镜背两面的下端采用减薄技术，为衔接镜柄加工半月形榫接面的预制技术，充分体现了“藏式带柄铜镜”镜、柄合体技术的发展和独特之处。

“桑嘎镜”发现于2007年，其埋藏特征显示该地点属202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发掘清理的桑嘎墓地。根据测年数据，桑嘎墓地经清理的5座石棺墓年代为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后，祭祀坑年代为公元6—7世纪<sup>16</sup>，结合铜镜形制、纹样及工艺技术特征与墓地测年数据综合分析，“桑嘎镜”的年代可能早至公元前后，晚至吐蕃时期，相对年代晚于“曲贡镜”等已刊布的四件“藏式带柄铜镜”，可归入“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晚期。

据藏文史籍记载，地处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温曲河谷一直是西藏古代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所处之地，如松赞干布（ལྷོ་བོ་མཚན་མཆོ་ལོ་ 617—650年）之父囊日松赞（གནམ་རི་ལྷོ་བོ་མཚན་）曾“赏赐蔡邦·纳森（ཆོ་ལྷོ་བོ་མཚན་）者温地方孟氏堡垒、奴隶三百户”<sup>17</sup>，“及至猪年，赞普驻于温之那波”“及至虎年冬，赞普驻于温之阿噶园”“及至鸡年，赞普驻于跋布川，节度藩之使者前来致礼，冬驻于札玛宫之后苑，于温之阿噶园中集会议盟，是为一年”<sup>18</sup>。已知的考古材料显示，温曲河谷早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就已是

15 李永宪：《“牦牛镜”与“藏式带柄铜镜”研究》，《藏学学刊》第27辑，2022（2）：15。

16 承蒙此次田野考古领队、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考古研究室罗布扎西主任面告。

17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62。

18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1992：146-149。

雅鲁藏布江中游古代文化的重要遗存分布地，自 1984 年发现切龙则木墓群<sup>19</sup>、加赛山墓群<sup>20</sup>、结桑村石棺墓群<sup>21</sup>之后，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在温曲河谷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又相继发现了桑嘎墓地、则日墓地、江日苏墓地、斯斯沟石棺墓、斯斯沟岩画点、桑布冶炼遗迹等多处类别不同的遗存，墓葬类型有洞室墓、土坑石室墓、石板（棺）墓等多种，其年代早至公元前 13 世纪，晚至吐蕃时期<sup>22</sup>。参照各基地的海拔高度，可知吐蕃时期墓地多高于“早期金属时代”的墓地，密集程度也不相同，推测不同时期墓地的选址与当时聚落人群活动区域的规划有关。温曲河谷“桑嘎镜”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表明，雅鲁藏布江中游可能是“藏式带柄铜镜”的主要生产地和流行区，而这一金属器技术传统的形成与持续，与温曲河谷“早期金属时代”各墓地出土的主流陶器一样，显示了该区域具有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也反映出雅鲁藏布江中游温曲河谷一带自“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到吐蕃政权时期其区域性文化的承继关系和地域特色。

调查：扎西次仁 平措扎西 李永宪 扎西东知 华青才让 边巴 沈云遥

摄影：沈云遥

制图：庞颖 钟雅莉 罗布扎西 李永宪

执笔：扎西次仁 平措扎西 边巴 罗布扎西 李永宪

19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 G 组 M1 殉马坑清理简报》，《文物》1985（9）：47-50。

20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乃东县文物志》（内部资料），1986：103-105。

21 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乃东结桑村发现古墓葬》，《考古》1985（12）：1142-1145。

22 根据“2022 年西藏文物考古成果公众分享报告会（一）”内容，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2023-04-05 09：02 发布。



## ABSTRACTS

### Investigation of a Handled Bronze Mirror in Samkhar Village, Kyepa Township, Nedong District, Lhokha Prefecture, Tibet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 of Tibet*

*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Xiza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handled bronze mirror collected by a monk from Tashi Dokha (Bkra shis rdo kha) monastery in Samkhar (Bsam mkhar) village, Kyepa (Skyed pa) township, Nedong (Sne gdong) district, Lhokha prefecture, Tibe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bronze mirror should be unearthed from the Samkhar tombs located on the northwest of Samkhar village. Its date is estimated to be between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Common Era and the Tubo perio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hape, manufacturing process, decorative patterns, animal image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nze mirror,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this bronze mirror belongs to the same techn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as the four published "Tibetan-style handled bronze mirrors", but its date may be slightly later. This bronze mirror reflect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rlung Tsangpo river from the "Early Metal Age in Tibet" to the Tubo period.